

會玩兒

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杨 原 著
肇姝妹 绘图



中 华 书 局

會玩兒

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杨 原 著

肇妹妹 绘图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玩儿:老北京的休闲生活/杨原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7.11
ISBN 978-7-101-12683-9

I.会… II.杨… III.风俗习惯-北京 IV.K8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2524 号

书 名 会玩儿——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著 者 杨 原

绘 图 者 肇妹妹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frac{1}{8}$ 字数 1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683-9

定 价 48.00 元

序 一

关纪新

爱“玩儿”，会“玩儿”，原本是我们人类的天性一种。

不过，有过一个历史阶段，“玩儿”，竟成了横遭指责的罪愆。似乎“玩儿”作为人类活动，已不再是生活中的正当诉求，却纯属于剥削者中间有闲阶层才能享有的专利。

拿到杨原博士撰写的书稿《会玩儿——老北京的休闲生活》，尚未细读，便由书名勾起了些许感触。

老北京的“会玩儿”，在世間很是出了些名的。这不仅由于北京较早就是一座偏重于消费的城市，人们并不生疏于玩耍；而且，无论您是以什么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它也算是靠谱儿——这座城市的“玩儿”文化，委实是跟清代以来旗人群体长期的生存状态，大有关系。杨原博士正是用一句“盐打哪咸醋打哪酸”，准确地切入了京师玩文化的由来。

按说，但凡作过国都的城市，因消费人口比例大，“玩儿风”都自然地会较别地更甚一些。所居人等，常常会把别地民众难得的谋生精力，挪移到“玩儿”（或曰“精致生活”）上面来一些。一个极端的故事是：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不高兴理政却喜欢躲在后宫

制作精美家具，显然也是“玩儿心”使然。

到了清代，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更是玩儿出了名，玩儿出了格。清中期以后，这座城市的“玩儿”，又颇带上了些群众性，而且还普遍带有鲜明的文化属性。

不能不退回来说说“盐打哪咸醋打哪酸”的旗人社会。清朝实行对京师当地旗、民分而居之的治理方式。以满洲八旗为主又辅以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旗人及其眷属群体，集中聚居于北京内城（由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这么一圈）。而旗人之外的所有居民，则被安置到北京外城（正阳门、宣武门、西便门、广安门、东便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右安门、崇文门围定的一圈）。在旗人社会里，成年男子都是铁定的、世袭的职业军人，守护社稷民生是他们唯一的生存职责。凡属旗人，除献身战争外，不得务工务农经商及从事一切其他营生。兵的后代只能是兵，两代三代，五代十代……多少代活生生的人，因八旗制度的捆绑而酿成无数的生命悲剧。旗人的先民多来自于广阔的山川旷野，养就了他们放任无羁的心性。至清前期战乱平息而后，太平岁月里的他们，被死死圈在一座城池之内，其精神苦闷，实在是无以复加。

在八旗制度一时间没法逃离的情况下，旗人将士及其眷属们只能朝着一切可资排解自身精神苦闷的方向导引自我。这包含吹拉弹唱、戏曲曲艺、琴棋书画、鱼虫花鸟、岁时游冶……设使将这些活动并为一个词儿，也就是“玩儿”。这个民族从来不缺少大自然

培养起来的天籁心性与艺术驰骋能力，他们把方方面面的“玩儿”，都打点的美妙异常。

京城旗人长期保持盎然的生活情趣，这包括对动植物的异常眷爱。贴近大自然，友爱树木花草和生灵万物，是他们的先民在崇尚萨满文化、从事渔猎的时代即具有的精神倾向，来到北京城之后，越是远离大自然，他们寻回自然之梦的愿望就越迫切明朗。旧日旗人家在房前屋后倍加精心地养花栽树最是普遍，即便是贫困到家里断了口粮，他们也不肯叫心爱的花木短了水，到了枝繁叶茂花卉绽放的时刻，再贫困的家庭也会漾出笑靥。喜爱动物，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引犬豢马、肩鹰调鹞、提笼架鸟……都与其贴近大自然的精神嗜好彼此相通。生活中有些活物儿在身边，哪怕是鸽鸟虫鱼也行，都让他们感到活得带着生气——这一点，跟中原民族的生活习性多少有些差异，所以，不免会引来相互间的“文化误读”。

我们的确该给“玩儿”正正名。在某个历史阶段，好像不管是谁，只要你爱玩儿会玩儿，就离“游手好闲”“玩物丧志”“腐化颓废”“醉生梦死”差不远了。更有甚者，还径直把爱玩儿会玩儿直接跟道德操守挂钩。

我们姑且不去说当初的旗人们在享用生活中随时有所发现及创造，在吃、喝、玩、乐等诸多方面曾给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真玩意儿，使人们迄今享用不尽；即便就这些人享用生活本身而言，同样也是无可厚非的。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时刻准备去沙场搏命的兵勇，在八旗制度下失掉了人身自由，用所得的微薄兵饷而并非不义

之财来料理生活，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们在有条件的时候享受生活，以不损害他人为尺度，一旦失去享受生活的起码条件，他们亦无怨无艾。这才是这个爱玩儿群体天然的道德指向。

清代囿于八旗制度的都市旗人，将生活的艺术化体现到了各个方面。作家老舍曾经在小说《四世同堂》中，对当年的旗人艺术生活场面，做过清晰的描绘：“整天整年地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子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有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老舍的这番话，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呢，还是发自内心的深深感叹？让人有点费捉摸。

不过，当初旗人们细细把玩生活百味的习性，和他们极尽想象“玩出了格”的种种样式，也融入了后来北京人的文化大千之内。殊不见，先前旗人们爱玩儿会玩儿的精神基因，生动活泼地传了下来——今日京城之内，玩花草、玩宠物、玩票戏、玩收藏、玩家具、玩音响、玩汽车、玩摇滚、玩麻将、玩博彩等的“玩儿主们”，正青出于蓝、层出不穷。而旗人后代在其中，早已不占什

么优势了。

老北京人（其中相当数量是旗人）的“玩儿”，常常是一类可以摆在文化层面上去看待的创造活动。杨原博士这本书，即从各个方面，对此做出了很好的注脚。现如今，京戏已然成了“国粹”，相声也已然成了雅俗共赏的民族文化颇具代表性的“玩意儿”，那可都是些由玩耍跟娱乐衍生出来的。

杨原博士的这本书，还只是就老北京的有形文化——包括票戏赏曲、花鸟鱼虫和岁时游乐，做了深入浅出的考察介绍。其实，老北京的玩儿在我看来，还理当涵盖无形文化内容。

例如“北京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京味儿语言”，或者叫作“汉语京腔”。清初入关而不得不渐渐改操双语的满族旗人们，不大习惯于旧有的前朝燕京方言，他们按照自己的语言文化习性，对旧式的本地汉语方言，做了不厌其烦的打磨改造，而后才逐步出现了摒弃某些古汉语痕迹及“入声”读音、具备“轻音”与“儿化”新特征，并且收入一定量满语词汇的清代北京官话。“汉语京腔”即这种新出现的北京官话，是原本操满语的满族旗人们依据本民族语言习惯来重塑汉语北京话的文化结晶。这一语言重塑过程，正是八旗制度下的旗人们群体性把玩生活艺术的时期。而玩味语言、“撇京腔”，也成了他们的人生癖好。“玩”语言，或许是最“经济”最不须破费的一种艺术玩耍，穷旗人们没有成本投入，也都“玩得起”；谁能把北京话讲得更字正腔圆、更诙谐俏皮、更有滋有味，便会引得人们倍加羡慕和着意仿效。一来二去，旗人们发现了自己的汉语

居然能够讲得比许多汉人还棒，自豪感便油然而生。老舍先生有一段话常常被引述，表达的正是旗人们这种在京腔创造上的自负与炫耀：“至于北京话呀，他（指小说《正红旗下》中的人物、满族青年福海）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

再比如老北京人性格当中的幽默。他们的这般乐观“雅好”，在中国人当中是数得着的。他们偏爱在生活视线内寻觅大大小小的“乐子”，以调剂心绪；即便是危难临头，或者苦痛甫平，也总是好此不疲。这自然也与清代北京旗人们置生死于度外，好从不轻松中间觅轻松，能从悲剧现实中间找“乐子”的特性，密切相关。这种幽默精神实乃宝贵的民族性情。这里有个现实的例证。备受推崇的国学大师、清宗室出身的启功先生，在生活中，就是那么一位好拿自己开玩笑的“老顽童”，他在一首《自撰墓志铭》中写道：“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试想，别个民族的国学大师级人物，恐怕是不会如此这般拿自己来“开涮”与调侃的。这样的幽默，打根儿上说，那也是坚持以达观心态玩味坎坷人生的精神结晶。

让我们都来从老北京的“玩儿”中间，找寻和得到点儿什么
罢。

权以为序。

2017 年清明前夕

序 二

阿 龙

有很多人曾经问过我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北京人，你用哪个词？”我说：“那就怡然自得吧！”我想这应该是老北京人给人的感觉，遇事沉着、处变不惊、见过世面、有里有面儿、风趣幽默、讲究规矩，也许是这种种的特性最后历练出了老北京人的那份怡然自得吧！

其实说到这里讲究规矩，在北京人的身上是无处不在，吃饭有规矩、穿衣有规矩、说话有规矩、待客有规矩、行动坐卧皆有规矩，就连本是放松的游戏玩乐也处处充满了规矩。所以初看杨原的《会玩儿——老北京的休闲生活》，我可以说是极有共鸣，有一肚子话要说，因为这里好多的玩儿，我自己都玩，所以捡几样玩儿，我说说自己粗浅的感受。

形容标准老北京人我记得有这么一个顺口溜“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饌，四季衣裳”，这其中的两句二黄说的就是京戏，老北京人或多或少都应该会哼唱几段京戏，就跟现如今的孩子都会唱流行歌曲一个样。这乾隆做寿，四大徽班进京咱就不讲古了，单说老百姓自己把唱戏当玩儿，这里边也有大学问。在这儿问大家一

个问题，“戏迷”跟“票友”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呢？各位过过脑子！其实真不是一回事，区别在哪呢？票友爱听会唱，戏迷可不见得唱戏，这其中的缘由您听我慢慢道来。

先说戏迷，那一定是痴迷京剧到一定程度的，要不不能称为“迷”，但是有些人就是再痴迷京剧他也绝对不唱戏，举个例子，慈禧是个知名的戏迷吧！都知道老佛爷爱听戏，而且给老佛爷唱戏，甭管多大的角儿都得提心吊胆，因为老佛爷懂戏，唱错一点她能察觉。但有谁见过老佛爷唱戏？实在是因为那个社会，人有高低贵贱之分，戏子那是下九流，唱戏不是什么露脸的事，谁家要是条件好能把孩子往戏班里头送啊！即便孩子以后成了名，甭管角儿多大，到头来还是人家的欢喜虫。《大宅门》里的万筱菊，角儿够大吧！七爷的妹妹想倒贴，您看把白二奶奶气成什么样。

但是票友就不一样了。票友对戏是又喜欢听又喜欢唱，甚至自己粉墨登场来上一段，清末溥仪的七叔载涛就是十足的票友，不光能唱文戏，全本的《安天会》唱的也是有模有样，扮演的孙悟空真可以说是赛活猴，据说后来的专业演员李万春也曾经在载涛门下请教过。但是别看票友也会唱戏，而且有些唱得还正经不错，但是票友跟专业演员有一个本质区别，演员指着唱戏挣钱吃饭，票友唱戏不但不挣钱还得赔钱，您得自己花钱置办行头，自己花钱请文武场面，自己花钱请人配戏，自己花钱包戏园子，更有甚者，自己花钱请记者报道，这叫花钱买脸儿，虽然一掷千金，但就是为了玩儿，您说北京人的玩儿瘾大不大。

再说这花鸟鱼虫，穷了穷玩、富了富玩，甭管穷富都能自得其乐。比方说这花儿，就拿九九重阳来说，那是赏菊的正日子，老北京的花乡古已有花洞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温室大棚”，总能应时应景地供应各种花卉，但是价钱也不菲，有钱的人家订购大量的菊花，讲究的甚至搭起九层花塔，穷人自然买不起，但是到大宅门前看看菊花总是不要钱的吧？所以您看，玩儿，讲究的是心态，我怎么都能玩儿！

再说这鱼，四合院本身就讲究天棚鱼缸石榴树，养鱼也是老北京资深的玩法，有钱人家养着名贵的金鱼，自己不用照应，专门请把式伺候。那穷人家就不玩了吗？该玩也得玩，要不怎么老舍先生笔下《龙须沟》里的小妞子天天嚷嚷着要小金鱼儿呢！一个金鱼，一个小金鱼儿，一字之差，价格可是天壤之别，这也是玩儿里的乾坤。

还有这鸣虫，那我就更有说的了，因为自己年年养，老北京大多养的是蝈蝈、蛐蛐、油葫芦、蛉子、金钟。从用途来讲，这里有用来掐架的，也有用来听叫的。从器具上讲，养蝈蝈讲究用葫芦、配牙口瓢盖儿。养油葫芦虽说也用葫芦，但是要用三合土砸底，配的是蒙芯儿。金钟讲究养在掸瓶里出音儿最好。这里头还有怎么喂养，怎么倒叫儿，说起来可就多了。

总结一句话，北京的玩儿要是敞开了说，那是没边没沿儿的，诸君还是翻开这本书，细细地品味吧！

自序

北京作为延续了几代皇朝的古都，大量的消费人口使休闲成为古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居民的生活方式自然与众不同，因此“玩”成为北京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清代直至民国初年，北京人的玩可谓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玩的名堂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很多原本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玩意儿”，登堂入室成为高雅的艺术形式，甚至它的衍生物也成为人们追逐的高雅玩物。

老北京人以爱玩儿而名于世，玩的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玩戏剧、玩艺术、玩花鸟鱼虫，以及随季节的变化而将自己融于自然中的玩乐。具体的玩儿，包括观赏戏曲、票房演出、戏剧的切磋，饲养花鸟鱼虫、匏制器皿，以及四季的游乐活动，如春天的逛庙会、看花灯、游春，夏天的游园、端阳耍青、粘雀捕虫，秋天的七夕乞巧、重阳登临，冬季里写九九消寒图、冰嬉等等，这些无不体现了北京人玩的精致、典雅，玩的优闲自得，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在自娱自乐中愉悦了身心提炼了情趣，这些“玩儿”无不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

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北京人的玩儿，特别是票房及票友们的玩儿，他们为京剧规范艺术，创立流派，在他们的推动下，将京剧发扬光大，使京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正是因为这种玩儿，票友们创造了不少新的曲剧剧种，如产生于乾隆年间八旗大军征战中的八角鼓，后来盛行于京内八旗子弟中，并在八旗子弟的票房里，经过改造发展成岔曲、单弦、琴腔、连珠快书等，极大地丰富了京城的艺术品种。

种养花草、豢养鱼虫的玩儿，则体现的是老北京人追求自然美、颐养性情的精神追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方式。以养鸣虫为例，不仅能让夏日的鸣虫在寒冷的冬天鸣叫，使人获得生机勃勃的气息，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也能愉悦人的精神。而由养虫养鸟而衍生的器具，居然也能独立成一艺术品门类，如蛐蛐罐、蝈蝈葫芦、鸟笼等，其中的佳品制作之绝，不逊于名瓷、紫砂等类艺术品，留存至今，弥足珍贵。如蛐蛐罐，制作材质繁多非常讲究，制作工艺还分南北两个流派，名家辈出。养鸟也是人们怡情养性的一种玩儿，其中的文化内涵也非常多。鸟的品种、养鸟的器具、训鸟的技巧，以及不同的鸟所用的笼子、鸟架子、笼罩、盖布、食罐、水罐等都是一门学问，都有很多的讲究和深奥的文化内涵。如鸟笼就分南派北派，鸟笼流派之中，首推北笼——京笼。明清宫廷都有造办处，制作上品；王公贵戚有闲阶层竞相攀比，鸟笼也成了一种可观赏的文玩，很多制作精良的物件成为珍

贵的艺术品。

除了玩戏剧、玩花鸟鱼虫，在一年四季中的各种游乐活动，也充满了浓浓的文化气息。如正月十五看花灯猜灯谜，郊祭先农、端阳登高、九九消寒……无不体现了都城市民追求大自然、享受自然的精神情趣，无不体现了人们对文化内涵的追求。所以说，北京人在玩中得到了精神的愉悦，在玩中追求更多的精神享受，获得更高的审美情趣。总之，老北京人的生活中有许多可玩和好玩的东西。其实甭管玩什么，都能玩出文化来。

北京人的“玩儿”具有普遍性，玩儿不仅仅局限于社会上层人士，而是全民的参与。例如京剧，北京人喜好京剧，人称从王公贵戚到普通市民，无不会哼几句“二簧、西皮”，以致出现“京师酒肆，无室不备弦索，二三知交，酒酣耳热，辄自操胡琴，琅琅以歌”的情景。北京人不仅听戏，而且组成票房自娱自乐，互相切磋技艺。清代票房还以旗人居多，民国后，不仅有大批的私人自组票房，而且不少机关团体、学校也都建立起票房。各大票房的对外演出（行话称之为“走局”），经常座无虚席，每每有名票参演时，更有众多爱好者为之奔走相告，甚至于很多专业演员都愿意免费为之“挎刀”（饰演配角）。听评书、听相声自清中期形成后，更是风靡北京，深受市民的喜爱。养花养鸟斗蛐蛐养蝈蝈也都是市民的爱好的。清代北京有句俗语，形容典型的市民居家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意为四合院院内养狗，养鱼，种树，种花，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生活状态。

其他四季的“玩儿”更是全民参与，正月十五观花灯、清明郊游放纸鸢、端午节登山等等更是倾城出动，形成全民参与的活动。

作为都城，市民的成分复杂多样，玩也依各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同是戏剧爱好者，王公府第多建有戏楼戏台，自设家班，购置了不少戏衣行头，还常请名伶到府中教戏、陪练，演唱自娱。市民的观剧场所则分为堂会、戏园、饭庄、会馆、庙会、戏棚等等，即使是戏园，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观众需要，划分出官座、池座、廊座，拉开了座位档次，观众可视自身条件选择座位。正规剧场，由于票价昂贵，普通的市民进不起，他们多在天桥、庙会的小戏棚子里看戏。评书是众多市民痴迷的，听书的场地众多，有宽敞豁亮的书茶馆，也有市场、庙会内的露天书场，听众依自身条件选择。听书客依职业身份不同，对评书的爱好也不同，东北城的听书客喜欢听袍带书；王府井以商人为多，他们爱听《施公案》一类的书；天桥的书馆听书者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有，那里日夜均有书场。最受欢迎的是《包公案》《小五义》《隋唐传》等。

养花鸟鱼虫，各个阶层玩的也是不同，一般人家养鱼，也就养几条小金鱼逗小孩儿玩。有钱的人家讲究鱼的品种，甚至还专请鱼把式来调养。玩蛐蛐、养蝈蝈也是市民的普遍爱好，但是玩的层次却不一样了，一般市民热衷到城墙底下逮蛐蛐，装在瓦罐里养着。上层社会不仅讲究蛐蛐的品种，养蛐蛐的器皿也非常地讲究，皇家使用御窑和官窑，精美无比；王公贵戚也以罐的精美、